

# 後社會史的困境與出路

潘利俠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本文詳述了史學範式的轉變和後社會史的特徵，在解析後社會史各種宣稱的過程中揭示出了後社會史的困境。後社會史雖力圖給予話語幾近完全的獨立性，但事實上是不能擺脫社會因素的決定作用談話語的，而後社會史的語言觀與新文化史相比也並沒有象卡夫雷拉想像的那樣有創新性，最終後社會史無法完成自己超越主客二元的目標。鑒於相關問題以往論者也多有涉及，我們也許應該重新認識經典的複雜，以期為解決當前的理論疑難找到突破口。

## 一 “社會” 範疇的興衰與史學範式的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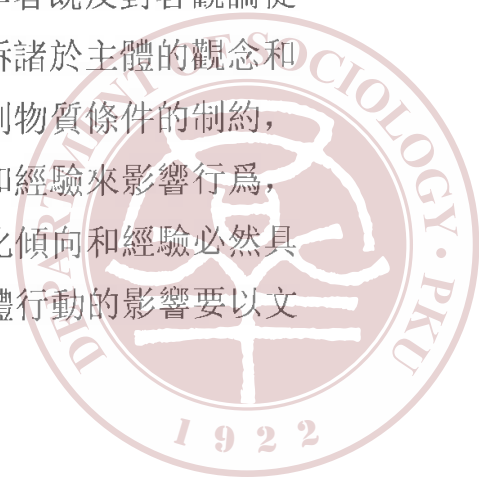
卡夫雷拉認為，一直以來，社會和歷史研究都預設了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實體，他們把社會經濟關係看成是一套自成體系、具有自身運作、再生和變化規律的客觀結構，社會就是這套超越個體控制能力、能夠決定個體行動方式的客觀結構，不能被化約為個體行動和能動性的結果。上述實體化的社會觀在十九世紀末興起，社會史的興起與這種社會觀密不可分。<sup>1</sup>

卡夫雷拉看到，1960年代，社會史在法英等國已經根基牢固，在其他國家也方興未艾。與傳統史學相對，社會史將分析的焦點從精英政治轉向社會現象和經濟現象，它反對傳統史學中的主體主義和事實主義，主張社會因果性觀念的基礎地位。在傳統史學中，社會實踐建立在一個預先構成的主體之上，個體行動和



歷史進程的原因都在於主體的意向和創造性。在這一前提下，傳統史學的史學家對於社會大都持一種唯名論的立場，即主張社會是個體行動的產物。而社會史則幾乎完全排除了理性創造意義上的主體性，個體行動的原因只存在於個體置身其間的社會背景，在意義的生產過程中，起因果決定作用的是社會因素，個體能動性無法超越社會決定因素的控制。經濟條件及由之產生的社會關係構成結構性的決定要素；這種結構性因素在某些情況下也包括人口和地理特性。意識、認同、信念、價值觀念由轉譯為社會區分 (division) 的社會位置決定，最終落實為法規體系或政治制度。社會經濟領域中確立的關係確定了個體的客觀利益，對客觀利益的滿足決定了個體的行動。

社會史僵硬的單向因果決定論即便是在其興盛之際也未能免遭質疑。從七十年代開始，社會史內部經歷了一場範式轉型，傳統社會史中社會背景和意識之間單向決定的作用方式被逐步打破，歷史學家越來越多的賦予文化領域一種相對的自主性，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個體在意義生產過程中的積極作用。社會經濟基礎和文化上層建築之間嚴苛的因果律日益鬆動，總體史的宏圖漸漸不可實現，史學研究呈現碎片化的趨向。然而，有限的因果性觀念也越來越不能令人滿意。微觀史和日常生活史之類的史學方法開始主張：個體做出決策、採取生活策略的能力，不能直接基於社會位置推斷而出；文化領域在整體上影響並重造社會經濟。他們認為如果要從個體特定性或群體特定性的角度來分析社會實踐，客觀決定的因果關係就要受到以上兩點的影響。這些新興的潮流代表了新文化史的取向。新文化史學者既反對客觀論從社會實在的角度來說明社會生活，也反對僅訴諸於主體的觀念和信仰來說明社會生活，他們認為社會生活受到物質條件的制約，但是物質條件的影響是通過個體的文化傾向和經驗來影響行爲，而非直接或機械的作用於行爲，而個體的文化傾向和經驗必然具有某種程度的創造性。所以，社會結構對個體行動的影響要以文



化符號為仲介，個體行動既再生產結構，同時也會創造結構。因此，新文化史將社會理論的重點放在物質屬性與符號特性、實在壓力與文化生成能力以及外在強制與個體主動性之間的各類互動之上。雖然文化表徵在新文化史這裏對於實踐具有生成性的作用，但是在卡夫雷拉看來，新文化史的符號表徵只不過是社會實在的內化，文化領域對於社會實踐的效力最終取決於文化表徵與社會實在自身屬性和內在法則的契合程度。文化對社會實在的建構都是根植於社會的，受到了個體所處社會位置及可支配資源的影響。正因如此，符號範疇對實踐的塑造才具有效力。文化範疇對社會實在的表徵在具體歷史情境中雖不相同，但這些表徵的性質都是具有客觀性的。<sup>2</sup>

部分史家在擺脫社會史範式的過程中重新賦予人類主體和文化以絕對的自主性，從而退回到了傳統史學或社會史之前的理論範式，在卡夫雷拉眼裏，這種修正論的調子並無任何新意。

簡言之，卡夫雷拉認為，傳統史學把社會化約為個體的能動性，而社會史則將個體行動化約為社會結構決定的結果，到了新文化史這裏，雖然主觀文化成了介於社會結構和個體行動之間仲介，但是形塑個體行動的主觀文化最終還是要受到社會結構的約束，社會結構決定了主觀文化形塑個體行動的空間，主觀文化並未真正成為介於社會和個體之間的第三者。這些以往的史學方法都局限於客觀論和主觀論、物質論和觀念論、社會強制和個體自由等二元對立之中，史學方法的演化不是加強這一方就是加強另一方，而二元對立中兩方關係的解釋始終是各類史學方法面臨的核心問題。這種在根本預設上的雷同導致了史學研究的徘徊和困窘。由此，卡夫雷拉看到，要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克服史學研究中的惡性循環就必須要打破原有二元對立的虛設。後社會史正是人們朝這一方向努力的結果。



## 二 何謂後社會史

在意識到以往史學範式的痼疾之後，卡夫雷拉提出了後社會史的設想。他認為，後社會史顯著特徵在於，它以實在——話語——意識的三元論代替了以往範式中實在——意識的二元論。“話語”在後社會史這裏，指由許多陳述、術語和範疇組成的一種特定結構，它們“以歷史的、社會的、制度的方式確立起來，作為某種真真切切的意義構成體系而運作，意義由此建構，文化實踐由此組織，人們由此表徵和理解他們所處的世界，包括他們是誰，他們如何與他人相關聯。”<sup>3</sup> 與新文化史中文化符號最終被歸於社會實在的制約這一點不同，後社會史賦予了話語高度的獨立性，除了僅受社會實在物質性的制約，完全具有自身自主的運作機制。“……作為話語的概念或範疇變遷並不單單是社會背景變遷所致，而是通過一套特定的再生產機制發生的。正如薩默斯的有力論斷，這些範疇既非內化的價值觀念，亦非外化的利益，而是構成了某種獨立的關係結構，基於其自身的內在規則與過程，並在與社會生活其他領域的歷史性互動之中，發展著，變化著。”<sup>4</sup> 由此，卡夫雷拉區分了意義與概念，概念在這裏被當成是話語的構成部分，它作為一個獨立的體系對實踐和意義的產生發揮構成性的作用，不僅強加于主體而且超越於主體，個體實踐只有在運用話語對社會實在進行了理解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因而即使存在自然客觀的社會實在，它也只能從物質方面對個體行動進行限制，這種限制並非結構性的，真正決定個體行動的則是個體通過話語運用所理解的社會客體，這個社會客體當然不再具有客觀性，它的樣貌取決於話語本身或者是個體運用話語的方式。意義不過是運用話語理解社會實在的結果。

通過這樣的運作機制，原本客觀的社會實在及受社會實在決定或制約的意識如今都由於話語的獨立作用而消解，不同的



話語，不同的話語運作機制及話語運用方式都可能導致對社會實在理解的不同，從而產生不同的意識，社會實在和意識喪失了客觀必然性，陷入了無限的流變之中，話語相對來說，反倒成了穩固和更具有決定作用的一方，後社會史因之既避免了客觀論也避免了主體論。從而，甚至在解釋歷史變遷的時候，卡夫雷拉也認為，所有新的社會情境或事件，都是憑藉此前情境傳承下來的諸範疇才能夠被把握、概念化或客體化的。也就是說，社會實在在生成概念的時候，並非從無到有，而是在與此前既有範疇體系的互動中完成的。所以，社會實在不再對概念生產具有決定作用，既有範疇本身的運作機制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如此一來，客觀的、結構性的“社會”範疇在後社會史的理論視角下就成了運用現代話語對實在進行界定的結果，因而也只不過可以對事實進行界定的眾多話語中的一種。

基於上述的理論闡述，卡夫雷拉最終把後社會史的研究核心定位在“界認、具體說明和揭示在各個事例中運作的範疇的意義體系。”<sup>5</sup> 準確分析作為個體和社會物質存在條件之間話語仲介過程的概念術語，評價它們在塑造實踐和社會關係中所發揮的述行性效應。對社會行動和實踐的說明，都必須以對概念本身的歷史形成過程有詳盡的分析。所以，對概念歷史形成過程的分析就成了卡夫雷拉為後社會史設定的關注焦點。

### 三 後社會史的困境

那麼，卡夫雷拉描述的後社會史範式是否真的如其所想，完全擺脫了以往困擾史學的二元對立，為史學研究找到了一條光明之路呢？以下，作者將從幾個方面來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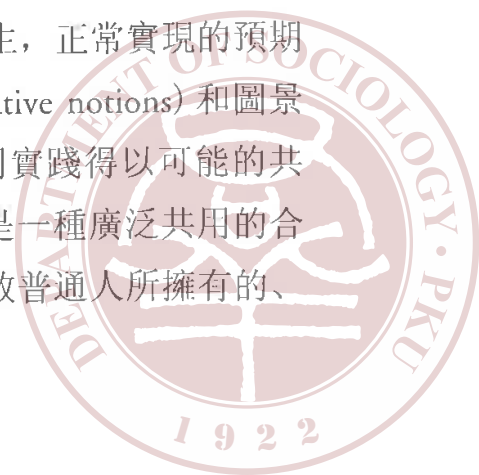




### (一) 話語與社會想像

如上所述，對於“話語”賦予的不同地位使得後社會史在卡夫雷拉眼裏全然不同于其他史學範式。卡夫雷拉明確指出，這裏的話語不同于傳統的話語概念，即視話語為使用中的語言，如表達、文本、言說行爲、溝通事件或會話事件、學科辭彙或專業辭彙；同時也不是社會史學者發展起來的話語的歷史分析中所指的“話語”觀念，在那裏話語與意識形態基本同義。那麼卡夫雷拉的話語究竟指什麼呢？前文已然提到，卡夫雷拉把話語看成是“一套協調一致的範疇、概念和原則，個人據以領會和概括實在（特別是社會實在），並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貫徹其實踐。”<sup>6</sup> 話語在這裏是一塊特定的社會領域，是人們用於理解實在並進行實踐的範疇體系，而不是預先內在於實在本身或由實在決定的。它是具有一定型構的概念體系，每一個概念的意義以及每一個概念對於實在的解讀都要將這一概念置於與其他概念的網路關係中去理解。爲了進一步說明話語的意涵，卡夫雷拉引入了“社會想像”的概念。他認爲：“每一套話語都各自包含或涉及一種社會想像，或一種有關社會的整體觀念……”。<sup>7</sup> 隨之，卡夫雷拉進一步將話語等同於社會想像，他使用了話語（或社會想像）這一提法<sup>8</sup>，用以再次強調，話語是人們理解實在，由以行動的範疇母型。人們不能超越這一母型。

誠然，在領會實在、促成實踐這一意義上，社會想像的概念的確可以說明後社會史中話語概念的意涵。查理斯泰勒用社會想像概念“來思考人們想像他們社會存在的方式，他們如何彼此適應，事情在他們和他們的同伴之間如何發生，正常實現的預期和這些預期背後更爲深層的規範觀念 (normative notions) 和圖景 (images)。”<sup>9</sup> 這裏，社會想像是一種使共同實踐得以可能的共同理解 (common understanding)，同時它也是一種廣泛共用的合法感 (sense of legitimacy)。社會想像爲大多數普通人所擁有的、



對社會環境的“想像”，這種想像一般通過圖像 (image)、故事和神話而不是理論術語來表達。泰勒把它比喻為既定群體可以支配的“劇碼庫” (reperatory)，它包含著事物通常如何以及應該如何這兩方面的背景理解，是一種對總體境遇的泛泛領會，界限不停，沒有結構，難以界定。泰勒認為，這一寬泛的背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道德秩序感，這不僅指對作為我們社會實踐基礎的規範的把握，也指一種使那些規範得以可能的感覺。這也是行動情境的重要部分。

對比十九世紀末李凱爾特、韋伯他們對人文學科特別是歷史學形成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對此處卡夫雷拉話語的概念有更為深入的瞭解。李凱爾特在那個時候早已對反映論的真理觀提出了質疑，他看到了由於現實的連續性和異質性，任何科學都不可能對它進行精確的反映。由此他指出科學的目的要麼是在“同質的連續性”中改造現實，要麼是在“間斷的異質性”中改造現實，前者是自然科學的任務，後者便是人文學科的任務。歷史在它那裏既是人文學科的一部分，也是人文學科的方法，歷史的方法意味着通過一定的價值關聯選定事實的某些側面，通過製造一種“間斷的異質性”來獲取對歷史事實特殊性的認識。李凱爾特一再強調，自己的“價值”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因為它至少是部分人共同的評價。<sup>10</sup> 甚至是自然科學其成立也有更為普遍的價值作為前提。

不能將社會想像中共用的合法感和共同理解完全等同于李凱爾特那裏的價值，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來，共同的評價和社會想像是重合的地方的。故而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在李凱爾特那裏作為科學成立基礎的東西在卡夫雷拉這裏已經成了備受質疑的物件，科學就這樣淪為諸多敘事的一種。我們需要進一步提問的是，是否因為科學的成立需要一定的前提，我們就可以放棄它；是否後社會史本身就可以脫離任何前提。



我們可以進一步通過社會想像來考察後社會史中“話語”的涵義。當社會想像是大多數普通人所擁有的背景理解時，它就不同於個別性的、異常的促成個體行動的範疇，而是一種被普遍接受的範疇體系。<sup>11</sup> 泰勒特別描述了個別理論陳述轉化為普遍社會想像的過程。在這裏，要經歷一個實踐與理論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修正，新的實踐會使此前只為少數人認可的背景理解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從而轉化為大多數能夠運用的社會想像。這裏明顯涉及到新實踐和某些新言說之間的相互親和，也慮及了從少數人所認可的理解方式到成爲一種社會想像中間是要經歷許多複雜過程的。泰勒不斷的強調，固然背景理解使得實踐得以可能，而也正是實踐帶來了這種背景。實踐對社會想像的作用遠勝於卡夫雷拉筆下實踐對話語的作用，在那裏，話語按照自身的規則運作變遷，卡夫雷拉爲了撇開社會決定論及主體論論調，將話語處理成了一個過於齊整的領域，並大大削弱了實踐對話語的作用。

我們可以斷定，在實踐對話語的作用過程中必然有各種社會因素通過實踐介入的過程，諸如作爲社會想像重要部分的道德秩序感，其中包含的規範和規範得以可能的感覺都是作爲社會因素而存在的。原初爲少數人所掌握的話語形式在最終成爲多數人認同的社會想像時，它的形式和內容必然已經因爲期間經歷的過程而發生了諸多的改變。像索緒爾在《普通語言教程》中所講的，語言是一種社會性的事務，是大多數人所認可的某種共同規則。而在從言語到語言的過程中必然有諸多社會關係、社會制度、習俗等因素的影響。社會想像形成的過程也是一樣，我們無法想像一種爲大多數人所擁有的共同理解在形成過程中不會受到人際互動、其他各類社會因素的影響，雖然這些因素複雜模糊，難以厘清，沒有特定的結構，但是它們的性質必然是社會性的，社會想像本身的含糊不清與這些影響因素的特點必然有所關聯。





因此，後社會史中各類社會因素介入其中作用而成的話語/社會想像雖然貌似獨立於社會實在，並對社會實在產生理解和形塑的作用，而實際上，擺脫了一個客觀性的、自然的、具有明晰結構的“社會”的作用，取而代之對其發生決定作用的是一個沒有固定形貌、運作方式模糊、性質多樣的社會作用形式，它獨立於個體之外，是由於人類共同生活而滋生的因素，為個體不能把握的力量，我們除了將之歸於社會的因素似乎別無他法。話語對行為的決定作用最終仍然不免追溯至這些社會因素對話語、進而對行為的決定作用。後社會史之所以以為自己擺脫了社會決定論，不過是因為它所預定的是實體化的社會觀，而忽視了齊美爾及受其影響的米德、戈夫曼等人所強調的、注重微觀互動的社會觀。即使是塗爾幹，在討論社會現象的時候也指出，社會性質是存在一種外於個人身體和意識的力量，無論個人是否意識得到，它都對個人行動具有強制性。根據這種定義，塗爾幹的社會現象既包括有關思想、行為和感覺的現象如法律、宗教和信仰、語言信號系統及貨幣制度、信貸手段、職業規範等等；也包括作為存在狀態的關於外貌、形態的現象如組成社會的各個基本分子、此類分子的形式和集合的程度、各地人口分佈、交通路況及人們的居住環境等。塗爾表明，這兩類社會現象的差別只在於表現程度的強弱不同，“因為存在狀態不過是以何種較為固定的活動狀態。”<sup>12</sup> 如穩定持久的政治關係會促成一定政治結構和政治組織的形成，時代傳承的居住習慣會形塑現時的居住狀況等等。<sup>13</sup> 按照塗爾幹的定義，後社會史中的話語只不過是塗爾幹諸多社會現象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外在於個人而對個人造成限制。

所以，並不像卡夫雷拉所說的，話語/社會想像的提法就消解了社會決定論，只不過是，這種決定論不是通過以前那種單一、明晰的因果關聯起作用的，而毋寧是，作為因變數的一方已經含



混不清、複雜多樣，過往的決定論模式已經難以用因果關聯的方式進行清晰的描述。

## (二) 新文化史與後社會史

“話語”一詞也是福柯《知識的考掘》一書中的核心概念。作為新文化史推崇的思想家，福柯對“話語”概念的使用在含義上與卡夫雷拉並不相同。福柯的“話語”概念主要針對知識領域，指涉諸如科學、文學、哲學、宗教、歷史等各個傳統領域的既有成果，表現為書面或口頭的文字，通常都呈現出特定的形態。這種“話語”正是卡夫雷拉要通過自己的“話語”概念加以解構的東西。然而，雖然福柯的直接研究物件是各種話語陳述和聲明，但他的主要研究目的卻在於揭示規範所有話語陳述的規則，從而進一步探究話語所以呈現出既定形態而非其他形態的原因。<sup>14</sup> 這樣的研究目的決定了權力問題最終成了福柯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福柯看到了他的“話語”概念其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種各樣的權力關係和社會因素。所以，在福柯的分析中，精神病學、醫學診斷總是和各種醫學機構、刑事規範、員警機構及其它社會機構和實踐聯繫在一起。

福柯的“話語”概念大體相當於卡夫雷拉所謂的“社會客體”，而福柯所探究的話語背後的規則則在一定程度上相當於卡夫雷拉後社會史中的“話語”，因此，他們二人的關注點事實上有共同的地方，不過最大的區別在於，福柯最終能從話語規則的討論繼續追溯下去，討論權力和各種社會因素，使規則的既有形態也被解構，卡夫雷拉卻把福柯那裏的規則單獨拿出來，視為獨立且決定性的一環，權力和各種決定話語形態的因素都被遮蔽在規則的背後，從這個角度來看，後社會史似乎是將原本更為複雜的東西做了簡化的處理。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語言學轉向的影響之下，歷史學研究深受結構主義、語言學、後結構主義以及解構主義的影響，語言不再是社會實在的反映，而是被理解成一種獨立的結構性體系，對個體行動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歷史事件乃至歷史變遷都被置於語言結構的支配作用之下進行考察。這樣一來，人類行動者的主動性幾乎徹底的喪失。卡夫雷拉的思考與這些學者的出發點同屬一類。他在論述社會史到後社會史的范式轉換時也提及了其後隱含的語言觀的轉變。但他對新文化史語言觀的界定前後卻存在些許的不一致。

卡夫雷拉看到了，新文化史的語言觀混合了“作為社會之鏡的語言與作為社會動因的語言之間的辯證關係”，<sup>15</sup> 他說，將語言不僅作為類比再現而且作為生成性的因素，這一點是新文化史擺脫社會史的原初核心時所能達到的最大極限。在闡述自己的後社會史方案時，卡夫雷拉將此前各類史學的語言觀歸於一種“工具性的，述願 (constative) 性的語言觀”，<sup>16</sup> 進而認為後社會史之所以與之不同，乃是因為它建立在構成性或述行性的語言觀之上。後社會史不再僅僅把語言理解為辭彙，而是把它理解為一種意義模式，積極參與人們所談論的客體物件，也積極參與主體的構成。我們可以看出，卡夫雷拉注意到了新文化史對語言生成作用的強調，這一點與後社會史類似。但他為了將其與後社會史相區別，對於新文化史在這方面的努力作了極為淡化的處理，而且在此基礎上，他堅持認為新文化史與後社會史的主要區別是，前者只把語言當成符號手段、溝通手段而不是意義模式，而在後者那裏語言是作為一種意義模式發揮其生成性作用的。

然而在述及符號手段與溝通手段不同于意義模式的原因時，卡夫雷拉卻不過是指出，作為符號手段和溝通手段的語言是“指稱事件、事物或觀念的單純詞匯或命名”，而作為意義模式的語言則主要是“賦予這些事件、事物或觀念以意義的積極主



動的生成因素。”<sup>17</sup> 這一描述似乎一下子又將新文化史的語言觀打入了傳統史學和社會史的語言觀，而忽略了作者一度注意到的對其生成性語言觀的強調。

除了以上的微小失誤，前文的論述也已經表明，卡夫雷拉對後社會史擺脫社會決定論的判斷並非公允，那麼由此推論，他將新文化史最終歸於社會決定論的一端，以此強化後社會史的開創性，這一點也終將難以成立，後社會最終也不免難以掙脫社會因素的束縛。

何況，如同約翰·R·霍爾(John R. Hall)在《歷史社會學》手冊中提到的，文化史死了，但它就像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所有的腦袋都被砍掉，雙倍的腦袋又從原處長出。”<sup>18</sup> 新文化史也是一樣。卡夫雷拉簡略的敘述顯然簡化了新文化史內在的複雜性。作為卡夫雷拉批判對象的新文化史代表湯普森(E. P. Thompson)只不過是新文化史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而被卡夫雷拉指為後社會史的許多人也許在約翰·R·霍爾這裏僅屬於“完整的文化轉向”。因此，卡夫雷拉極力強化新文化史的一致性與保守性，從而便於構築自己的後社會史，而究其根本，後社會史並不一定在核心要義上超越了新文化史。

### (三) 兩難與虛妄

爲了與社會史和新文化史中社會決定論的預設斷裂，後社會史所做的工作是在社會現象和社會客體之間進行區分。社會現象作爲自然物質性的社會，社會客體則是人們通過話語運用所領會的社會，後社會史認爲，後者才是行動發生的促動因素。由於人們用於理解社會的話語不會固定不變，所以社會客體的作用和結果就是複雜多變的。後社會史以爲通過這種方式就能去除社會史和新文化史中存在的社會決定因素。且不說這一理論預期在新文



化史中早已存在，單就這一理論預期是否實現本身而言，正如前文我們論述的，後社會史所極端化的話語獨立性的確成功的將社會決定因素從對行為的作用中去除了，但是這種做法似乎更多的體現了一種爲了方法論上的標新立異而簡化理論複雜性的方式。

另一方面，傳統史學的主體論也是後社會史所要避免的另一個陷阱。通過強化話語的獨立性，將話語變成一個遵循自身體系自主運作的領域，個體的能動性在這裏幾乎完全被遮蔽。儘管出於某種免於話語決定論的考慮，卡夫雷拉也不斷提及，話語與實踐的互動才是歷史事件真正的解釋因素。但是，話語的完整體系畢竟是卡夫雷拉最爲關注的事情，實踐的影響力最終僅被限定在了物質性制約的層面。而話語體系本身也是按照自身的規則運轉變化，期間實踐能起到作用微乎其微。這樣一來，後社會史的確可以擺脫主體決定論，但是卻要不可避免的滑入話語決定論。在某種程度上與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類似，這雖然是卡夫雷拉不願看到的，但卻似乎沒有找到可以真正避免的有效方法。從語言轉向後的困境出發考慮問題的卡夫雷拉，最後也還是沒有超越語言轉向之後的困境。

既然後社會史在這兩方面的努力都不成功，那麼它成爲一種新的史學範式、爲當前史學另辟新徑的宣稱就必然陷於虛妄。也許，在深厚繁雜的歷史面前，任何簡化的、形式化的方法論宣稱都會顯得力不從心，最重要的不過是真正的面對歷史本身。

#### (四) 後社會史眼光之下的“後社會史”建構

按照卡夫雷拉的理論，社會現實固然存在，但真正對個體行動起作用的是個體通過話語透鏡構建的有關現實的圖景。在卡夫雷拉這裏，話語範疇具有優先的作用，它的變遷雖然在與社會情勢的互動中進行，但是社會情勢對其只有物質性的限制作用，





而且話語範疇本身有自身的邏輯原則，按照自身的軌跡演進，歷史的變遷只有在話語層面事先發生了變動的前提下才能實現。我們可以以一種看似戲謔卻也符合邏輯的方式用後社會史所主張的這一套方法論來分析卡夫雷拉整個構建“後社會史”的過程，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分析方式，其結果也許對於評判後社會史的可能性更有價值。

我們可以把“後社會史”看成是一套話語範疇，把歷史學家實際的書寫實踐看成是這裏所說的社會情勢，而把人們對歷史學家書寫方式的理解看成是話語建構的社會實在。後社會史作為一個新概念在此還沒有得到廣泛的承認，因此還算不得是卡夫雷拉所謂的社會想像意義上的話語範疇。那麼，在這個新概念像話語體系轉變的過程中，會有哪些因素起作用呢？

卡夫雷拉為了確立後社會史範式的合法性，列舉了許多在他看來已經在從事後社會史實踐的歷史學家。而在卡夫雷拉看來，比較系統的堅持話語獨立地位的斯科特也並沒有徹底的在歷史書寫實踐中將其方法論原則貫徹到底。斯科特在《男人和女人的工作身份》一書中，將工人工資下降造成的原料壓力當作工人採用特定話語的原因，<sup>19</sup> 這顯然是社會決定論的調子。造成這種方法論陳述和具體歷史分析相左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歷史分析工作本身的複雜性和歷史學家處理問題時對張力的包容，另一方面也與話語範疇的形成過程本身就受社會因素決定這一點有密切的關係。

卡夫雷拉固然可以通過後社會史這個新概念形塑人們對社會實在的領會，讓人們把某些歷史學家的工作看成是後社會史性質的。但是，這個新概念若要從個別性的概念轉化為一般性的社會想像，僅憑這個概念本身所具有的話語形塑力量是遠遠不夠的。人們之所以選擇接受這一概念體系來形塑社會實在，並不全是因為這個概念本身的意涵更讓人信服。按照泰勒的說法，新的觀念和新的實踐更契合，在這種情況下，新的觀念就會日漸廣泛的傳



播，成爲一種社會想像，當然在此過程中，概念本身也經歷了修訂。觀念與實踐契合這一要求本身揭示了在一種社會想像形成過程中實踐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遠非卡夫雷拉所描述的那麼有限。卡夫雷拉把社會現象和實踐的限制僅局限於物質層面，這是不太現實的，今天，我們恐怕很少有人相信，物質層面的因素不會對心理層面產生影響。並且，如果僅有話語層面的單方變動，缺乏實踐層面的變動，社會想像同樣難以形成。

而且，就像我們在討論話語和社會想像的關係時已經提到的一樣，在社會想像形成的過程中，各種社會因素都會介入新觀念和實踐的互動。比如說後社會史要得到廣泛的承認，不僅在於它能夠成功的解釋歷史學家新的歷史書寫實踐，而且也要看人們是否會出於各種各樣的考慮接受它爲解釋歷史的主要方式，在這裏，卡夫雷拉的名望和地位，《後社會史》發行的數量和範圍，還有其他各種超個體的偶然隨機的因素，都可能決定人們是否採用這種解釋方式。社會決定因素混雜莫辨，但並無削弱。

#### 四 出路何在？

通過以上各個層面的分析我們已經看到，後社會史試圖打破原有史學方法論的僵局，探索一種新的歷史書寫方式，這種嘗試並不成功。後社會史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只是一副混雜模糊的社會因素與行動之間的決定關係。我們身處人群之中，社會似乎已無法避免，儘管社會的意涵可能會變化不定，但它們始終都是一種超個人的力量。面對這種混沌的社會運作模式，我們是否還可以爲其尋求一種方法論上的依託，或者是否乾脆放棄任何對於方法論的形式性陳述？實際上，這前一種尋求未必沒有可能。



我們已然看到，脫胎于新文化史的後社會史儘管不斷的強調自己與新文化史的斷裂之處，但無論從它構建理論所借用的資源還是它的理論闡述方式本身都明顯與新文化史具有同樣思想淵源，即人類學、文學研究及福柯理論的影響。卡夫雷拉自己也承認，後社會史身上有很濃重的福柯的味道。<sup>20</sup> 但如前所述，後社會史反而簡化了福柯的複雜性。不過無論是福柯還是其他，無論六七十年代文化的興起背後的理論資源多麼的紛繁支離，他們開始質疑主觀論和客觀論這一二元對立的傾向卻早就以一種更為徹底的方式出現在更為早期的思想家那裏。後來者常常浮光掠影的從偉大的思想家汲取隻言片語，通過把它們發展到極致來建立自己貌似新奇的思想框架，而原作者思想整體中蘊含的思想張力和深度卻往往被稀釋和遺忘，致使某些本已被解決掉的問題仍然持續的困擾思想界和學術界，紛呈複雜的思想主張並沒有給這些問題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浮躁爭執中的支離破碎虛構了思想的繁榮。

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海德格爾就對西方傳統的主客二元論進行了徹底的反思和重構，他使用了與此前全然不同的術語和闡釋方式，構造起了以此在在世為核心的一套嶄新的現象學。海德格爾將人的存在方式稱為此在，他認為此在與其他存在者的不同，他不是一個現成的存在者，而永遠都是“去存在”，即對此在來說，可能性總是高於現實性，他的存在總意味着對將來可能性的種種籌畫，在此過程中獲得自己的存在。並且，此在從來都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此在在世界之中操勞，與其他事物打交道，各種事物由此向此在展開，與此在一起形成一個意蘊的整體。海德格爾還認為，以往之所以有主客二分的對立，就是因為以前的哲學家們把此在當成了一個封閉的主體，在世界之外對此在進行孤立的考察，從而不能把握此在存在的真正意義。



在這一分析基礎上，海德格爾闡明了自己的歷史觀。由於此在是有限的、向死而生的存在，所以他是具有時間性的存在。此在的歷史性正是源於此在的時間性。這種歷史性是“作為在世的存在生存著的存在者。歷史的演曆是在世的演曆。此在的歷史性本質上就是世界的歷史性。”<sup>21</sup>

海德格爾關於此在在世的論述及在此基礎上對歷史性的闡述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二元分立的困境，但是海德格爾最終只把歷史性賦予本真此在，即是說那些沉淪于日常生活中的常人被視為是沒有歷史性的。因為此在首先是沉淪於日常生活之中的，所以此在首先以日常的方式領會各種生存可能性，只有此在決心在這些可能性中做出選擇，才意味着他承受了這種歷史流傳下來的可能性，在當下對其進行重演，在這種重演中把本身的可能性帶給自己。所以消散於日常生活的非本真存在是沒有歷史性的，僅僅在先行決心中籌畫自己的本真此在才有歷史性。海德格爾認為歷史學是“從本身的歷史性生長出來而有所重演的就可能性揭示著曾在此的此在”，他把歷史學的課題標定為“實際生存曾在的可能性”<sup>22</sup>。所以歷史學在這裏不是針對現成存在和當前之物，不是探求普遍規律或描述個體性的事件，而是探求實際存在的曾經的可能性，把包含在它課題中的存在者無所掩蔽的在其存在的源始性中揭示出來。這種歷史學設定使得只有通過整個傳述史才能逼近曾在此的東西本身，而具體的歷史學研究只可能對本真的課題保持或遠或近的距離。

海德格爾對決心的強調透露了明顯的精英論和意志論傾向，這種歷史觀使他可能又跌入了主客二元的陷阱，但是，作為其歷史觀基礎的“在世界之中的”此在生存狀態必然有助於消解社會史和新文化史中存在的客體論和主體論的對立，並且在一個同樣反復多樣的意蘊整體之中，解決後社會史觀念未曾清除的社會



決定因素含混多樣的問題。若能將“常人”納入歷史的論域，那麼，海德格爾的思想將在很多層面與當代的論題關聯起來。

當然，以上想法只是建立在對海德格爾理論的膚淺理解上，意在提出一個可能的向度，提醒我們在困頓於許多當代的理論疑難時，重溫古典並重新留意古典理論固有的複雜性也許終會讓我們豁然開朗。

假如在承認社會、話語、意識三元區分的前提下，如果不以消除這種區分為目標，我們可能仍然有走出後社會史困境的可能。一種做法是我們可以賦予三者同樣的獨立性，把現實的行為看成是三者共同作用相互影響的結果，最終便可以達到避免各種社會決定論和主體論的可能，這樣也更符合現實裏行為發生的邏輯。這只是本文作者的一個簡單設想，在此提出以供探討，就不再做更深的論述了。

## 注釋

- 1 Miguel A. Cabrera, "The Crisis of the Social and Post-social History", *The European Legacy*, Vol. 10, No. 6, 2005, 611-620. 在實體化社會觀興起的同時，唯物主義和客觀主義也在社會科學領域內興起；而公共生活領域內，則出現了一個立足于勞工運動的新階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不斷發展，福利國家和公民身份被制度化。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社會和歷史研究領域的許多學者都開始質疑上述實體性的“社會”觀。圍繞著“社會”範疇的興起與危機，社會和歷史研究的範式也在不斷的被重新反思和定向。卡夫雷拉在這裏只關注社會科學方法論層面的問題。
- 2 參考米格爾·卡夫雷拉，《後社會史》，李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24，
- 3 同上注，31。
- 4 同上注，29。
- 5 同上注，162。
- 6 同上注，30。
- 7 米格爾·卡夫雷拉，《後社會史》，李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31-32。





- 8 同上注，32。
- 9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 以下相關論述見同書第2章。
- 10 H.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歷史科學》，塗紀亮譯杜任之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 11 當然，體系這個詞用在這裏有些牽強，因為按照泰勒的定義，社會想像是非結構性的、無限索引、十分模糊的。
- 12 塗爾幹，《社會學方法的規則》，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11。
- 13 《社會學方法的規則》，第一章。
- 14 參考福柯，《知識的考掘》，王德威譯（臺灣：麥田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章。
- 15 米格爾·卡夫雷拉，《後社會史》，李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8。
- 16 《後社會史》，37。
- 17 《後社會史》，37。
- 18 傑拉德·德蘭迪，《歷史社會學手冊》，李霞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72。
- 19 理查·比爾納其等著，《超越文化轉向》，方傑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32。
- 20 《後社會史》，李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60。
- 21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439。
- 22 《存在與時間》，446。

